

# ■新作聚焦 朱朝敏《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 为乡民立心

□岳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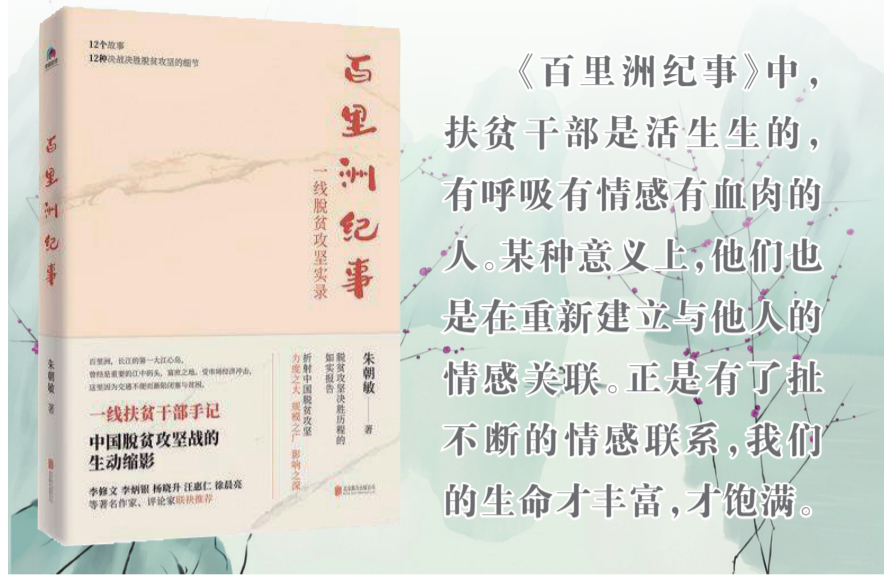
作为土生土长的枝江百里洲人,作为投身于精准扶贫的干部,《百里洲纪事》大概是朱朝敏过不去的一本书。每个作家大约都有这么一部书,必须要写,不能不写,否则,它就会一直噬咬你的心灵,让你觉得无从向手中这支笔交代。朱朝敏这位一向以小说作为创作体裁的作家,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家乡的涓滴新变娓娓道来,将父老乡亲的心灵之困抽丝剥茧,在深入乡土社会复杂肌理的同时反求诸己,某种意义上也打开了文学的一条新路。

不同于大多数报告文学将经济置于脱贫攻坚战役的核心,尽管朱朝敏也会详实记录扶贫对象的基本情况和扶贫措施,但这只是她叙述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她就将沉默的浩瀚如大海的人心作为自己工作的对象。她长久地凝视着那片海,她决心勇敢地打开自己,以心换心,她要温暖那些犹在困厄中的心灵,重新拥抱已经退回到记忆中的乡村。我知道,这一切对于我的那些羞怯的谨于言辞的乡亲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啊,那些在生活的苦水中哀哀煎熬的人,怎会如此轻易打开心扉,去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哪怕是些微的善意呢?一次次的锲而不舍,一次次的感同身受,一次次的设身处地……我说的扶贫干部,也说的是记录者朱朝敏,这才有了沉甸甸的《百里洲纪事》,让我们得以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

那是一片怎样的景象啊。在朱朝敏的笔下,有真实的精神疾病病人:因为给棉花打农药而造成大脑神经损伤的杨勇,有因为儿时患病打针伤了脑袋的小赵,有被双亲抛弃、受辱致残的金蓉,有偏执型的精神病胡子林,有诉诸暴力的周建波。他们是今日贫困之因,也是贫困之果。朱朝敏耐心地汇入历史的河流,进入他们的生命故事,寻找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比如,当她用“好人”称呼周建波的时候,这个饱受乡村暴力之苦的汉子刹那间从狂暴中清醒,短暂地恢复了神智。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语言的力量。我们谁不是被语言所定义与刻画呢?就像一个农妇的朴实之言,“只要说说话到他心坎上,

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不独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朱朝敏意识到,在时代的剧变中,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多多少少心理上出现了空洞。那个行为乖谬、在耄耋之年执意要去拾棉花的姨婆婆,何尝不是因一直活在老无所依的恐慌中;那个拒绝他人靠近、孤独终老的杨春天,长年累月的沉默中难道不是蕴含了撕心裂肺的呐喊。“归根结底,精准扶贫真不是仅针对吃穿住行,而是人心问题。而人心……那隐藏在血肉之躯里的大海,幽暗而广阔,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澜起伏,时而一览无余,时而望不到边际……”这是一个作家的的心灵脉动,也是扶贫干部以行动获得的真知。

我特别注意到,对于叙写的扶贫对象,朱朝敏刻意避免“贫困者”这一称谓。即使不得不用,她也加上引号。她更习惯的说法是,身处命运低谷的人们。她未受那种将金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的侵蚀,从不以俯视的目光看待那些挣扎在困厄中的人们。她很清楚,他们陷入如今的境地,是历史积淀的原因,更多时候也是偶然。人生一世,谁没有遭遇命运偷袭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正在承受命运暴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他们与苦难不屈不挠地抗争的样子,恰恰可以照见人的光辉与尊严。这也是这部作品隐而不彰的主题。在《我们想要虞美人》中,覃老太待人接物清淡,清洁自律,洁身自好。尽管条件符合,她也不愿意被当作五保户,原因在于,她始终对于儿子的归来心存信念。她一方面悉心照顾被侮辱被损害的儿媳,一方面不屈不挠地要为她寻找正义与公道。尊严,是人的脊梁。任何时候,任何境遇,都不能放弃对于尊严的坚守。更让人敬重的是,覃老太并未将自己一生的遭际推诿他人,而是化作了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动力。由己及人,福泽乡里,覃老太这样的人,就是中国乡村生生不息的血脉。在《后遗症》里,我们跟随朱朝敏的目光,去见证一个劫后余生的家庭。当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李桂香扶着遭遇车祸、重度瘫痪的熊贵生艰难地走向家门口的单杠时,我被深深地震动了。这是积蓄在生命内部永不枯竭的



《百里洲纪事》中,扶贫干部是活生生的,有呼吸有情感有血肉的人。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在重新建立与他人的情感美联。正是有了扯不断的感情联系,我们的生命才丰富,才饱满。

蓬勃能量,是照亮生命的奇迹。这样的故事,确实极大地安慰与鼓舞了我们。

朱朝敏对于扶贫有着朴素的理解——“眼下的农村,经济收入少带来的贫困的确存在,但这现象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追根究底,离不了天灾人祸和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说白了,人情世故、世道人心,是一口大油锅,在时光的火焰上被烧烤得沸腾,煎熬着我们,无人例外。而那些时运不济的弱势者率先经手,我们伸出一把手——别说我们帮了什么,只不过是建立一种关系去见证,见证一个事实:时间如何剥开真相,摊开了那些创伤疼痛给我们看,关于生存,关于人性,关于生命。无一例外的共同伤痛下,我们的伸手与其说是为了他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说,这是她的世界观,也是她的方法论。这一深刻理解也决定了她笔下的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的关系。那些扶贫干部,不再固化为伟光正的人格形象,而是活生生的,有呼吸有情感有血肉的人。他们或许要承受扶贫对象的不理解,不断更新、调整观念,并根据扶贫对象的特点,探索个性化的扶贫之路。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在重新建立与他人的情感美联。正是在扯不断的感情联系,我们的生命才

丰富,才饱满。有情有义,才是有滋有味的人生。

顺便说一句,读《百里洲纪事》,于我而言,也是纸上返乡的过程。这不是百里洲的第一次文学再现。之前,赵瑜、胡世全就以《革命百里洲》一书追踪了这片土地的革命前史。现在,在朱朝敏绵密悠长的叙述中,家乡父老的语音语调如奔腾的音符接踵而至,那泼辣的生动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声音,是我关于故乡的深刻记忆。山川风物,故里良景,一一历历在目,乡愁油然而生。这得益于朱朝敏精准的素描,也得益于她的倾情。没有情的文字,是死文字。当朱朝敏将浓得化不开的深情投入到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辛苦劳作的人们的时候,百里洲再度焕发了文学的神采,成为我们心中不舍的惦念。

“被记下的细节,修复了遗忘,故而文字不老。”这是朱朝敏赠给我的话。我理解她的意思。尽管她不止一次强调自己只不过是观察者、呈现者,在我看来,她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者。当她拆除了固有观念的藩篱,带着体察人心的自我要求走进扶贫现场的时候,她是在记录历史的强劲脉搏,同时,也扩大了文学的半径,通向更广阔的人间。

## ■创作谈

百里洲是长江中下游交汇处的一个洲岛,千年泥沙淤积而成,曾有九十九洲,后又连成一个整体,耸立于江心。为水包围又临水而生,这种充满悖论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矛盾的生存哲学。它的逼仄常常反转出阔豁,它的遗世独立不经意就走出了桃源似的松散逍遥。然而,它天生闭塞保守,拒绝工业提速,物质上的贫困也在所难免。但我必须说起它,不间断地说起它,就像说起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命运。

现在的讲述,我给它设置了前提,精准扶贫政策下的乡村叙述。

真切地忠实记录这块土地的生活原态,记录他们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悲辛欢愉,首先是以镜头的形式。

我是拍摄者。四围环水的地理环境下,洲岛耸立,沙土沉淀的孤岛阡陌纵横,却是良田千顷,“桑田甘果,映江依洲”,大美而不言。它固环江堤防长74公里,合百余华里,故俗称百里洲。百里洲拥有212平方公里的版图面积,41个村庄和10万有余的常住人口。这方地域因水孤立,因水拔萃而出,“孤岛”的称谓再合适不过。它的气质天生就具备文学意义。

我更是一名忠实的记录者。百里洲因为四围环水,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有6076人。脱贫攻坚战下来,百里洲每年减少近300余名贫困人口,尤其是2017年以来,枝江市每名干部和工作人员均对口帮扶一到五户不等的贫困户,2019年,百里洲圆满完成了脱贫任务,将贫困人口减至零。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巩固年,也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年。这些年来,帮扶者和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就在他们拉手的一刻,两者便融合成一个词:脱贫。你知道,他们总是复数,总是低谷彼此的融合,而在融合中,身份便互换。何为?助人者即自助。那些身处生活低谷的人,不过先领受命运的困厄再给我们这些幸运者提供生存之道。如此,我拿笔记录时,记下的绝非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命运。

而我又是聆听者。还是一名接受恩典的受惠者。他们的事迹,被还原为日常生活的原态,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下不动声色地展开,并细化为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简单概括——“生老病死”,生活有所保障,生存能获得尊严。这哪是只属于他们的课题,还是大家的,是所有人无法摆脱的共同命运。能幸福地生活,活出尊严,是这个时代的共同课题。

聆听者、记录者,这些角色的界定下,我遇到的人、事,不是故事传闻,而是一曲曲朴实的不屈不羁之歌。这是大地和水流共同铺设的一座寺庙,每个闯入者不经意间就被幸运地点化,福祉的声音贯穿周身。此际,大地在,流水在,天空在,孤岛在。我在,你在,万物归一。写下它,孤岛的扶贫纪实文字,不如说是写下新农村的当下生活,或者说是当下时代的农民原生态的生活。

显然,这部有关精准扶贫的纪实作品,它是物质的,收入、支出、房子、家庭、身体、环境……充满了日常。但是,人之为人,更多的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留守儿童、养老送终、老弱病残、精神障碍、心理隐疾、道德信仰、人性人心,如何深刻地把握当下乡村的问题症结?如何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两方面唇齿相依互为依靠。物质贫困的表象下,是人性人心问题,是人情世故问题,精准扶贫的国策和文学意味的叙述恰恰在这里发生了重合。

我之所以强调当下乡村问题的时代背景,用具有代表性的精准扶贫的事例记录当下乡村的生态环境、道德信仰、人性人心、生存现状,意在不仅要记录精准扶贫政策下乡村的生存现场,还要记录精神现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字系列,给予当下乡村的心理关注,不过提供了一个参考,从心理层面关注,来反映这个群体内心的困惑及其突围。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活出尊严才有依据。

荣格说:“谁向外看,就在梦中,谁向内看,他就会醒来。”给予那些身处低谷中的他们的关注,不再只局限于物质上,还要着重于精神和心理层面,让他们获得价值感和尊严感,这才是真正的脱贫,扶贫攻坚战也就落到了实处。

## ■短评

# 重构革命战争历史画卷

——评薛海翔的《长河逐日》 □王小平

在漫长的生命岁月中,个体无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并最终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成为他/她自己,同时,无数个体的经验、情感、认知又将形成巨大的合力,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推动历史如长河般奔涌向前。薛海翔的《长河逐日》探索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多声部交织的复调书写,呈现了一幅开阔、宏伟的革命战争历史画卷。

《长河逐日》的写作源于探寻父辈生命历程并为历史真相留影的强烈冲动。在作品中,作者综合运用历史资料,包括实地调查笔记、父辈回忆以及档案资料等,建构起了坚实的家族革命历史叙事。在“序言”中,“我”分别来到马来西亚太平监狱和中国江苏涟水县普安集镇,寻找父母早年生活的痕迹。随后,在父母生命中的每一个居留地,叙事者都进行了实地考察。作者每到一处,均对眼前的现实细细描绘,并与历史相对照。类似于田野笔记的考察记录,使父辈过往的生活环境变得触手可及、如在眼前。通过实地考察,作者还收获了意料之外的诸多史料,从而为《长河逐日》中的个体回忆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作品中往往采用文献互证的方式,在如实记述父辈回忆的同时,还援引官方文件、第三方资料。正如作者所说,这部作品并非通常所见的为父辈歌功颂德之作,而是呈现了思辨过程、探究过程,试图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相”。

在《长河逐日》中,作者意在勾勒、探寻人物生命轨迹,少有历史背景介绍,与常见的传统历史叙事模式不同。社会历史的变迁实际上反映的是无数个体的生命诉求,这是其“必然”性。同样,薛联对八路军的向往,表面上是与家庭的不幸遭遇、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单纯渴望有关,但深层原因却是小学校长潜移默化影响,而开明民主的年轻校长身后所关联的五四现代思想及教育理念,则又是另一套宏大历史话语。由此,在《长河逐日》中,个体生命细节的背后,处处潜藏着历史的草蛇灰线,读者自可一一连缀。

另一方面,历史洪流浩浩荡荡,并非由某一个人的意志决定,而是由无数生命、无数具体而微的事件汇聚而成的合力推动向前。无数个体在被历史改变、形塑的同时,又反过来参与、影响着历史进程。在《长河逐日》中,郭永绵逐渐从“南洋文青”一变而为果敢坚决的战士,“他的肉身和灵魂,一起被放置到铁与火的砧板上,遭受无休止的捶打,在高温、重击和淬火等一应俱全的锻炼程序下,南洋特质和热带风情被剔除干净,身心和灵魂被重新格式化,他活了下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作者深入体察这种改变,认为除了对敌人的“义愤”之外,可能还有着在战争中被唤醒的、潜藏在“正义”自觉下的自卫本能,以及在长年战争与政治斗争运动中所形成的、在自卫心理驱使下所产生的确认自我力量的深层渴望。这种个体的“浴血重生”固然是战争所需要的“成长”,但也造成了特定的“战争文化思维

模式”,在和平年代可能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个体所付出的代价,形成或隐或显的信息印记,最终都将融入社会历史的有机体中,被保留下来。对此,作者显然有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一思考亦在于对母亲薛联个性、思维方式的分析。在考察母亲的从军经历后,他写道:“这个过程,让她不知不觉中,与环境、组织和制度融为一体……她会忠实地执行整体需求的任何要求,为了达成目标,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这种独特的战时生活形态和精神结构,“是一柄双刃剑,既支撑着薛联和她的战友们,不畏不惧不动摇地走过最为艰难险阻的历程,却也种下了在建国后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盲从信任自投罗网屡遭迫害的人格根由”。这是富于辩证的论断。

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话语中,战争中个体的生命感受、心灵体验往往难以得到有效表达,同时,其对历史走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容易被遮蔽。《长河逐日》试图在充分还原个体鲜活生命经验的同时,探索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尝试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作品中多声部的复调叙事有着重要关系。作品中汇聚、融合了来自各方的声音,父辈的回忆、官方的历史文件、第三方资料、叙事者的感受与思考等共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繁复、绵密的文本。尽管作品的主体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历史资料,但叙事者的声音并没有被淹没在这些材料中,而是紧密追踪各种线索、细节,力图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分析当时的情势,辨别事情的真相。这种复调叙事使文本保持了可贵的思辨张力。

在作品中,叙事者并不仅仅是父辈回忆、历史资料的整理者与记录者,同时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除了实地考察、获取地理空间实感经验之外,又以“后发经验”去审视“先发经验”,通过史实的查考以获得史识,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此外,还综合调动想象力、判断力,分析当事者的内心世界,深度介入逝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检视过去,从而获得更高维度、更长时间内线的观照视角,由此摆脱对“当下”、“此在”的黏着,而产生更为清醒的自我意识。

薛海翔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始终以真挚饱满、生气盎然的文学创作践行着初心,《长河逐日》的问世,是又一座新的高峰。作家以更为开阔、深邃的历史意识与清醒、冷静的思辨力度重申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写出了父辈一代如夸父逐日般壮丽、恢弘的生命历程。他写出了历史的无情与冷酷,也写出了岁月的宽容与悲悯。他对父辈生命的观照与检视,有着对子女的同情、体贴,却又坦荡、真实,既具有“后发经验”的高度与深度,又富于历史现场感,充盈着鲜活的生命实感经验。历史如长河般生生不息、永日奔腾,惟有回顾来时路,方能重温、唤醒那峥嵘岁月中所包蕴的无数个体生命信息。《长河逐日》无疑是一份忠实的记录,也是一份珍贵的纪念。

# 聆听者与记录者

□朱朝敏

## ■第一感受

# 玄幻与现实共存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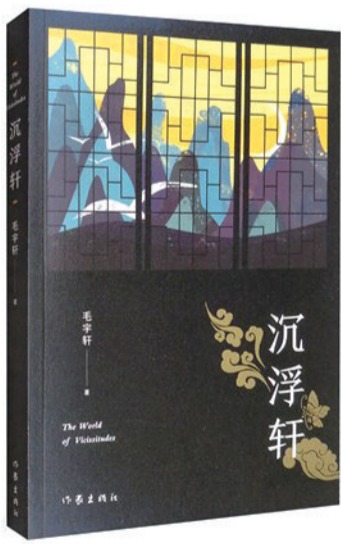
——读毛宇轩《沉浮轩》 □黄建龙

读毛宇轩的长篇小说《沉浮轩》,扑面而来的青春的气息。神鬼妖异的外壳,人物的语言、姓名,无不映射出作者独特的风格。小说可大致以第三章为界限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三章及之前为三个几乎独立的短篇,之后则开始以轩中人物为中心展开,分叙各有侧重又连贯的故事。其中,又以《血腥玛丽与铁观音》上中下三章为重,着眼于人情、人性与权术而非言情,向我们展示了玄幻向与现实向的材料在同一叙述时空里结合的可能性。

小说的前半部分由三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各具现实原型。如果说《沉》介于轻小说和传统小说之间,那么前三章几乎全揽了传统的部分,其中又以第二章最为出彩。

该章节的叙述形式很是很新颖独到。作者以11小节连缀成一章,一三五七九十一为一条线,二四六八十为一条线。单数小节推进以校园霸凌为题材的症结线,双数小节则着手神灵介入的解决线。巧妙的是,单数小节中的几人物皆以第一人称进行独立叙述,一个具体的人名都没有出现过。加之作者有意的含蓄,使得情节极富推理小说的意味。单数小节所展现的故事及多个细节,需要仔细且往返地勘察才能得到正确结果。而独白式的叙述和人名称谓的隐去,更容易给读者一种暗示:人人都是这个“我”,“我”在这代人里具有典型的意义。但是双数小节沿袭了一贯的轻松风格,与单数小节的抑郁氛围镶嵌在一起形成象征意义——生命崩溃的过程就隐藏在热闹的生活之下,一如平静的海面下总有暗涌一样。

该章首尾都提及《追风筝的人》,想来这本书至少给这一章提供了灵感。甚至,这一章极有可能是在作者结束《追风筝的人》的阅读不久后作的。显然,它激起了作者想要发声的欲望。在《沉浮轩》中,腐烂、阴暗和痛苦由主角以神力介入消去,在这富含浪漫色彩的处理中,不难看出作者心地的良善。但同时,贯彻前半部分的一个缺陷也浮现出来,苦难的易逝使苦难失去了意义,也使本章对结构精巧、立意切时的全局有所损害。从全书来看,这是现实意味最浓的一章,同时也是神异色彩最淡的一章。由此可见,玄幻题材和现实内核在小说中仍然有着近乎本质意义上的冲突,此消彼长。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现实意义的消解来源于对命运的无视。在小说的末尾,主角最根本的悲剧正是来源于,这一次她决定不再插手命运了。她看到



了命运,既无奈又甘愿地接受了命运,这才产生了悲剧和崇高。

小说后半部分完整地交代了主角“寒”(即蝶舞)如何走向早已预见的死亡。直至看到结尾,读者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寒早已知晓自己的结局。一个从未犯下罪障的人,被卷入他人的命运漩涡,知死赴死,为小说添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同希腊神话中无法逃避命运的俄狄浦斯王比起来,寒更像是主动成全了命运的权威性。在此,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命运如何保证她一定遵从自己的权威?进而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怎么保证读者相信她一定会走向注定的命运?《沉浮轩》中使得寒甘愿赴死的原因或许稍显无力。事实上,支持她赴死的理由在半途便坍塌了。此处需要先讨论一个问题:来自愈亲密的人的背叛是否难以忍受?我想是的,并且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道理:托付得越多就越经不起背叛。只有泛泛之交才经得起无数背叛,多年后也许依旧能做到表面和睦。秉持着这种认识,我对小说中的兄妹之情起了疑惑,遭到权术愚弄并背叛的亲情的还能维系得住吗?这样的断垣残壁中还留有什么重塑的可能性么?在后续的情节中,我没有找到这种可能性,于是一度以他们之间的亲情就此结束。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位遭遇兄长背叛的小妹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重逢、作战、牺牲,一切都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我还没为她找到一个恰当的借口,她便“哗啦”一声,消失了。

有趣的是,结尾处连续转换了数次叙述时间,把读者给搞迷糊了。这又仿佛是在告诉读者:她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没错,但此时此刻她到底处在哪个时间节点上,死或没死,甚至到底按不按这条线路发展都未可知。话锋一转,又声称:脚下的路最重要。收束全篇,将结尾投入一片不确定的混乱中。那么或死或生,或喜或悲,停留在何处便是仁智各见了。此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确是一处妙手飞白。

李健吾赞成雷梅托“不判断,不铺叙,而在了解,在感觉”的观点,也是我所认同的。一路读来,我从《沉浮轩》中体会到许多趣味。从小说中洋溢的《山海经》风味、青春娟秀的语言,无不能窥见作者的精神世界。最可贵的,作者试图在神鬼与人之间寻找可能性,在玄幻外壳和现实内核之间寻找可能性,这是一种无畏的探索。